

史海撷零

——
史实和传统文化

林明星◎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史海掇零

——
史实和传统文化

林明星◎著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海摭零：史实和传统文化/林明星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597-926-7

I. ①纪… II. 林…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7181 号

史海摭零

——史实和传统文化

林明星 著

责任编辑：张传桂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出版人：焦红辉

印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3000 册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597-926-7/K·43

定价：29.80 元



前 言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人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当时社会的弊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里敢于冲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陋习，不顾保守势力的种种阻挠与反对，立志改革，勇于创新，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统治者昏庸腐朽，横征暴敛，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刻，许多激于爱国思想的诤臣，他们忠肝义胆，忧国忧民，不顾自身安危，冒死进谏；有的甚至揭竿而起，反抗强权，解民倒悬，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有许多言行刚直，疾恶如仇的人，他们对深为民害的贪官、权豪深恶痛绝，当人民遭劫之际，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敢于抗争，在恶势力之前表现出宁折不屈的精神。在民族危难时期，他们发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抛头颅，洒热血，马革裹尸，为国家、为民族的生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为造福人民而埋头苦干，锲而不舍，以他们的创造和发明去改造自然，改造环境，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长期管理社会和国家的过程中，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也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和规范人们言行的伦理道德。此外，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乃至饮食起居、器物用具……，等等。这些“中国的脊梁”立功、立德、立言，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们创下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汇成了丰富的、璀



璨的文化宝库，这就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这份富赡充物的精神财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在于他批判地吸取和改造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进步的灵魂。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他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就是善于总结我国几千年来人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改造自然的、有形的物质文明，也包括体现在风格、道德、观念等无形的精神文明成果，紧紧地联系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高瞻远瞩地、与时俱进地加以改造和创新，做出富有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科学决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人民服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都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又充满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精神”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正处于一个伟大历史转折阶段，对古代历史的回顾有助于加深对当前的了解。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冲破了“左”的樊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但是，对历史事件错误解读，或者粗疏缺漏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前一阶段有人觉得南宋王朝以偏安妥协、忍辱屈膝的政策换来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这种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于提出要为秦桧翻案。不久前还有一个思想非常“前卫”的艺术家竟在自己的创作中让秦桧站了起来。尽管这位大艺术家一再声称无意为秦桧翻案，但总会令人联想到“小泉拜鬼”这种煞风景的事。又如不少旧史家对崇祯皇帝都是同情多于斥骂，因为他毕竟能“宵衣旰食”“焦心求治”，一登基即诛杀魏忠贤，甚至做到“国君死社稷”，因此他们认为明朝之亡是“气数使然”。时至今天，竟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说：“让他承担亡国之君的罪责而永远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岂不是太



不公平了吗？”这位史学家忘了崇祯皇帝恰恰是亡国之君而非中兴之主。当然，见仁见智，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又如，唐朝的文成公主彪炳史册，博得美名。可是另一个功业相同，甚至更具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女性——金城公主却被忽略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部酷刑峻法——《御制大诰》，居然能宣传得如此深入，在那时候却是不容易的。再如，西方教育史把苏格拉底（前 469—99）奉为启发式的鼻祖，其实孔子（前 551—479）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一观点时，苏格拉底还没有出生呢！在教育心理学方面，“迁移”这一术语虽是近代才被提出的，实际上两千年前，孔子已经熟练地运用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长期教学实践中，从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偶得其一毫一粟，同时也于前彦和时贤的成果中得到一点启发，于是不惮浅薄之讥，谨以区区芹献之心，将历年发表的几篇文章加以筛选辑录，付诸梨枣，聊作抛砖，或是弄斧之举。

有人说，这本书是个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诚然，本书的确内容芜杂，它是原来起名为《史海摭零》的一些篇目和另一本叫《孔学管窥》的部分篇章，加上一些凑不成一本书的文章拼凑而成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几经改造，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并被当成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它对历代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以至于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不能不涉及儒家的思想与学说。苏绰的《六条诏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像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亚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费奥克基斯托夫在纪念孔子诞生 2550 年为国际儒学联合会而写的《儒家哲学在 21 世纪的展望与地位》中所说的：“将儒学思想仅仅局限于它的‘古典时期’是错误的，应当看到，儒家哲学是随着历史发展的。”“传统，包括哲学传统，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一国特色之所在。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儒学不但要继续发展，更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坚实基础。”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中国今天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实行的内外政策，确定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既有现实的根据，又有历史的渊源；既符合人类发展的趋势和时代潮流，又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例如，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不正体现了“和为贵”“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协和万邦”的思想吗？这也正是我国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的传统理念的反映。又如，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只要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存在，传统文化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带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如果人们“无道极了”，那也只好“一起打合，混沌一番”（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了……，要举的例子当然很多，但并不需要过于烦琐和唠叨。文化思想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何况，几百年之后，“现在”也就是历史了。这就是不惮他人嗤之以鼻，拼凑这本大杂烩的道理。

本书引用了很多时贤的现成的观点，恕不一一注明，请原谅。

林明星

于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目 录

重才 知人 善御

——汉武帝的御臣术 (1)

从北魏的三道诏书看均田制的施行 (6)

六条诏书是西魏、北周革易时政的纲领 (14)

献身民族团结事业的中华优秀女性

——金城公主 (25)

俗吏不知方 掊克乃为才

——宋初官吏坐赇刻剥种种 (35)

兼磨断佞剑 拟树直言旗

——王禹偁的《应诏言事疏》是北宋改革的先声 (47)

“庆历新政”与“朋党”之争 (58)

雄气堂堂贯斗牛 誓将贞节报君仇

——“绍兴和议”的前前后后 (65)

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

——明太祖朱元璋的人才观 (74)

法制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普法宣传

——《御制大诰》的颁行 (83)

清初的廉政建设 (95)

传统文化对封建政治的影响

——“天命观”与“罪己诏” (107)



聚古今之精神 实治乱之龟鉴

——学点古代公文 (118)

清代朴学的先河

——陈第的学术成就 (124)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一)

——孔子的教学观 (133)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二)

——孔子的教学观 (147)

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孔子的德育思想 (162)

性相近 习相远

——世界上最早认识、运用迁移规律的人 (178)

从“与点”看孔子的政治理想 (198)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之一 (208)

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之二 (213)

“以德治国”的运作机制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之三 (221)

三个代表是推进以德治国的行动指南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之四 (227)



重才 知人 善御

——汉武帝的御臣术

【内容提要】汉武帝把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加以完善并巩固下来，其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努力搜罗各种人才有控制地使用。他改进并完善古代选举方式，首创由中央与地方官员推举人才，经测试选拔的察举制；他知人善任，用人不拘常例，不问出身，经发现后即简拔使用；他敢于突破古训，起用负俗之累的人；同时注意培养后备官员；他还善于驾御那些驽弛之士。西汉时期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大都集中于他在位期间。

【关键词】察举制 知人善任 御驽弛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是由他加以完善并巩固下来的。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努力搜罗各种人才有控制地为己所用。史学家们用“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资治通鉴·元狩三年》）来评价他并非夸张溢美之词。

他改进并完善古代的选举方式，首创由中央与地方官员推举人才，经测试选拔的察举方法。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刚即帝位就诏令丞相、列侯、刺史、守相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更明确地诏令那些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意思是说他将亲自以“古今治道”来策问他们，经考



核合格后即任以官职，同时把这种方法确立为制度，即察举制，并成为汉代重要出仕途径之一。

汉武帝对这种察举方法并非只是说说或下个指示而已；也不同于汉文帝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贾生》）。为表示对贤才的重视，他经常策问，发现文学才智之士即提拔使用。建元三年，诏选贤良文学，简拔其俊异者宠之。此后庄助^①、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枚皋、终军等，都分别被任命为郎中、谒者、光禄大夫、中郎等职并常在其左右。他召见主父偃、徐乐、严安时，深感“相见之晚”，立即拜为郎中。特别是主父偃，一年之中竟连升四级。他看了董仲舒的策问后，不仅采纳，而且立即拜他为江都相。庄助以贤良对被擢升中大夫。赵绾推荐申公，他“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资治通鉴·建元二年》），尽管申公对答不合他意，仍然被他任命为中大夫。

汉武帝还注意培养后备官员，重点是培养掌管文化教育方面的后备人才。他在中央设立最高学府——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者可为郎中。”（《汉书·儒林传》）就是说成绩优秀者可以为官，这就把读书与做官联系起来，使读书成为挤身官场的又一途径。察举制初行之际，各地执行不力，有的郡甚至没有举过一个人，所以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颁《议不举孝廉者罪》诏，规定中二千石、礼官博士等不奉诏者以不敬论，“阖郡而不荐一人者”是“化不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汉书·武帝纪》），应当论罪。这份诏书推动了察举制的实行。

汉武帝人才观另一特点是知人善任。他不讲出身，不管资历，无论士大夫或者普通平民，甚至贩夫走卒，他都敢于大胆任用。金日磾^②本是被送往官府当奴婢的匈奴休屠王子，由于勤谨、笃实忠诚，不仅拜官马监，擢升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封秬侯，还与霍光同受遗诏辅助少主汉昭帝刘弗陵。卫青本平阳公主家奴，为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与霍去病大败匈奴，屡建奇



功，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他晚年深悔从前行事之非，决定实行政策的转变，而把这次转变政策的重任交给“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③的霍光；以在治粟都尉任内有“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政绩的桑弘羊为辅政大臣，他们都能“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寤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盐铁论·制复篇》）“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前汉书·昭帝纪》）。这些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疆事务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有所鼎革。

汉武帝不仅能广泛收罗人才，而且也善于驾御人才。元封年间，汉武帝已及于知天命之年，思想也趋于成熟、历练，认识到以前只是收罗孝廉，难免有些才能卓异而由于不遵礼，不入俗而见斥于当时的人才被埋没了，因此，他突破了“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④和“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管子·玄政》）的古训，在元封五年（前166年），又颁了《求异等茂才诏》，令州、郡察举那些负俗之累^⑤的茂才异等之士，表明破格取人才之意。这份诏书重在征荐那些不受规矩绳墨的不羁之士。足见其求才心切及用人不拘一格的策略。

汉武帝敢于突破古训，是因为他对这些负俗之累的贤才有一套驾驭的办法。他认为对那些“泛驾之马，跼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⑥这是汉武帝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观其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的《敕责杨仆书》（《汉书》卷90《杨仆传》）与颁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报李广书》（《汉书·李广传》）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杨仆骁勇善战，多次参与征战，南粤反，汉武帝拜他为楼船将军，命他率兵首破石门、寻陜^⑦，力挫粤锋，以功封将梁侯，但杨仆以此屡夸其功，桀骜不羁。李广善骑射，多次抗击匈奴，被匈奴称为“飞将军”，屡立奇功，但始终未得封侯。最后随卫青击匈奴因迷道贻误战机被责而自杀。先前他在免官居蓝田山中，一日夜猎，被霸陵尉呵责，止宿亭下。后李广任右北平太守，请霸陵尉随军，不久借故把他杀掉。



这两人都有“非常之才”，但一个居功骄傲，伐其前功；一个胸怀狭窄，睚眦必报。都可以说是“蹶弛之士”，汉武帝在将要重用他们之际，都能针对其毛病加以鍼砭。对杨仆是揭其短以抑其骄；对李广是叙为将之道以拓其胸襟。他对两人的批评可以说是一矢中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武帝之所以警惕臣工，驾馭将帅者，略见于敕责杨仆、赐严助等书，史称其雄才大略信矣夫！”真德秀这样评说是有道理的。

正因为汉武帝重视且善于选拔人才，所以《汉书·公孙弘传》中说：“汉之得人，於兹为盛”。诚然，他在位期间，集中了西汉时期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思想家、经学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农学家赵过、经济学家桑弘羊、外交家、探险家张骞、水利专家兒宽、徐伯，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名将卫青、霍去病、程不识……等等，可谓人才济济，他们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注释】

①庄助：本姓严，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会稽吴郡举贤良对策，建元中拜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武帝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闲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

②金日磾：（前134—前86）日音“mǐ”。磾，《辞源》与张舜徽主编的《汉语辞典》均注“tǐ”。王力《古代汉语》注“dǐ”。《广韵·齐韵》为“都奚切”；颜师古注为“丁奚切”；丁树声《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收在“dǐ”下条，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赐姓金，《汉书》有传。

③见《汉书》卷八六《霍光传》：“光为奉常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闕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闕，门。禁闕，指宫禁之中。

④“为政在人”，人，指贤才。根据朱熹的解释则是：“身”指



国君，“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意思是必须选取那些能修身以道，并能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姑且录在这里以备参考、判断和择取。“为政在人”，《孔氏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这样说法语义更明确。

⑤负俗之累：为世俗所讥讪。指那些不遵礼教而受世俗责难的人。

⑥跣弛：狂放不羁，不自检束。跣，音 tuò。

⑦寻惬：地名，在今广东始兴县西。《史记》作寻陕。



从北魏的三道诏书看均田制的施行

【内容提要】从“计口授田”到“计力授田”，北魏的均田制是总结、继承、发展历代优秀田制思想和农村公社某些传统而形成的。它从北魏起到唐代颁布两税法时止，实行了近三百年。它所以能够实行这样长的时间，其原因一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尽量做到“土不旷工，民罔游力”；二是鲜卑族统治中原乃系“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征服“比较高的经济情况”即汉族，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恩格斯语）。它的实施对鲜卑族的封建化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计口授田 畿内课田 置三长 检括户口 计力授田

土地兼并是封建土地制度所特有的严重问题。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高度集中问题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董仲舒“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的限田办法，实践已证明它“率不得适行”（《前汉记》卷八）。何休（公元129—182年）提出效法“圣人制井田而口分之”的“复井田”办法，企图用封建土地国有制代替私有制，他当然也无法逆转历史发展的规律。仲长统（公元179—19年）则主张“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归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后汉书·仲长统传》附载《损益》）前者未脱董仲舒限田窠臼，后者收荒地为官田，再按劳力强弱授田给无地农民。这两种办法充其量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但按力授田



却为北魏均田制立下张本。

为什么均田制不能在汉族统治的地区实行，而却只能在北魏统治的地区才行得通呢？这有它主客观的原因：

主观上，不管北魏统治者实行均田的目的是什么，但其指导思想始终是着眼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尽量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结合起来，即所谓“力业相称”，做到“土不旷工，民罔游力”（李安世《均田疏》），这种经济思想是符合生产发展规律的。

客观上则与鲜卑族统治中原是“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征服“比较高的经济情况”即汉族，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从“计口授田”到“计力授田”，从《京畿课田诏》《置三长诏》到《均田诏》颁布的历史背景来看，都说明了上述问题。

—

鲜卑族拓跋氏原是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游牧部落，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后，即“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北史·贺讷传》），开始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并逐步向封建制度转化。

早在拓跋氏进入中原前，北方经过十六国的战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以下凡引《魏书》者皆只书篇名）“千里无烟”并非夸张之词。“农不垦殖，田亩多荒”（《高宗纪》）。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片荒田需要劳力来开发，从天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元年（398年）至太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号）元年（435年），拓跋氏先后从山东和被征服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迁来数十万“新民”（其中也有部分是俘虏来的），“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受田”（《太祖纪》）“帝临白登山，观降人，数军实，给农器，计口受田”（《太宗纪》）。这些被迁徙的“新民”和只有少量土地的原氏族成员是北魏王朝户调、力役和兵役的主要负担者。北魏自公元398年建国到419年统一黄



河流域的三十年间，征战频繁，赋役十分苛重，单粮食一项，常调每年户达粟二十石，此外，还有杂调、横调，如泰常（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年号）三年（公元418年）就“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高祖纪》）；力役也十分烦重，天赐（道武帝拓跋珪年号）三年（公元406年）筑南宫门就调发八部民五百里内所有男丁，此后明元帝拓跋嗣修宫苑、筑长城，太武帝拓跋焘开通沙泉道，都是浩大的工程，诚如《宋书·谢灵运传》里所说的“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身祸家破，阖门比屋”，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频年屡征，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户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世祖纪》）“编户人家，困于冻馁”“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高宗纪》），逃亡者很多，赋役无源，甚至发生“六军乏粮”而以桑椹为食的事（见《崔实传》）。

大力发展生产，防止逃亡，有效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劳动，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以保证足够的赋税和军粮便成为北魏初期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统治者不得不把劝课农桑当作内政要务。魏初历代统治者都有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如天兴初拓跋珪“制定京邑……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①”（《食货志》）。神瑞（明元帝拓跋嗣年号）二年（公元415年）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圃，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藪牧，养畜鸟兽。”（《食货志》）。太延元年诏书指出：“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世祖纪上》）。太平真君（太武帝拓跋焘年号）四年（443年）诏曰：“牧守之徒，各励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世祖纪下》）。

太平真君年间，魏恭帝监国时发布的《畿内课田诏》则是一份明立法令进行课督的诏书。它与以前劝农诏明显不同之处是不仅只是一般号召；而且提出措施：规定了带有农村公社互相帮助性质的贫富相通原则和人牛力换工的办法，如有牛家出牛一头为无牛家耕